

重点研发计划取代863、973之后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回应委员关切

本报记者 杨雪

实施方案、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参加后续的项目遴选和评审工作。考虑到公平、公正、公开,未来参与评选的专家可能从专家库中随机选取。潘峰认为,参与前期规划的专家多为领域资深学者,对国家需求和顶层设计具有清晰的理解。而随机选取的评审专家不一定能对整体布局有战略上的考虑,特别是对专项不同方向之间的取舍和平衡难于决策。

“申报项目的科研人员也感到迷茫和困惑”。潘峰举了一个例子,指南中明确指出,“鼓励依托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然而,没有描述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体量申请这类大型项目。“还有其他具体而重要的问题,如项目组成的经费体量、青年科学家项目的具体要求、对任务考核指标的理解等,指南中也缺少描述。”

“纳米科技等重点专项作为基础研究类专项列出,体现了国家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重视。”潘峰说。如何理解“通过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全链条一体化设计”?潘峰认为,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需求的总体要求非常重要。但是,对以基础研究为主的项目提出全链条一体化的要求可能值得商榷。“改革前,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项目的分类很清晰,863、973和科技支撑计划可以分别实现。潘峰认为,改革后,如果要求一个经费体量为千万元级、实施时间为五年的基础研究项目完成全链条过程是不现实的。”

“会考虑短有短的设计,长有长的设计”,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回应潘峰,他们会根据每一个计划从基础、技术到应用的规律来一环一环设计链条长短。对于一些资深专家可能会被排斥在项目实施之外的担心,李萌介绍,目前,7万多规模的专家库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完全按照制度规则运行,抽取专家时可能会形成不了小同行评议,而是大同行评议,大同行专家有可能并不真正了解某专业方向领域。“我们在想通过一定标识的办法来解决。”

李萌说,等通过一年的运行,可能还会有更多问题浮现出来,是好事。“只要能发现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

■两会话题

“前不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面启动,大家翘首以盼的重点专项指南终于陆续发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重大科技计划正式开始。”8日,中科院计划财务局副局长潘峰委员在科技界联组讨论会上谈了他的感受。潘峰参与了一些重点专项的规划、实施方案和指南的编制工作,深感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特别是政府部门退出直接管理项目后,对承担项目全过程管理的专业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也同时感到目前存在一些项目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按照现行规定,参与“十三五”规划中一些重点专

编者按 3月8日上午,全国政协科技界和科协界召开联席会议,委员们畅谈科技人员关心的焦点问题。青年人才收入低、公平竞争环境欠缺……面对种种尚存的科技界时弊,焦急的委员们再次呼吁改革。

知识产权保护没跟上网络技术脚步

本报记者 张盖伦

8日上午,政协会议科协联组讨论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田力普委员谈起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个老话题遇到的“新问题”——网络技术发展。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用户群体,但也恰恰是这个群体,相对来说知识产权认知度比较低。海量的网络交易也产生海量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田力普回忆说,2014年他们曾经进行调研,光阿里巴巴一家,全年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案例就超过1000万件,“比除中国外所有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国家投诉案例加起来还多”。

令田力普感到欣慰的是,新的《专利法》正在修订中,其中增加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但他认为,目前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美国,你发现网络侵权盗版,拿着法律文书就能让侵权者停止侵权行为。但是在中国,法院审理结果出来需要耗上一两年的时间,这就削弱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田力普指出,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探讨如何高效、快速实现知识产权保护。

对于目前我国正在探索建立的知识产权法庭,田力普认为,它还缺一个核心环节——知识产权终审法庭。“不同地区审判结果不同,会影响司法公正性、公信力,终审法院可以负责处理有争议案件的上诉。”

副教授住民工屋 青年教师负担重

本报记者 高博

“我的一个博士后,毕业后住在清华西门外的棚户区。”清华大学教授王光谦委员说,“他是山区来的学生。现在在北京一高校工作,每月拿4000块钱,租房、买房都不够花,就租了民工住的小屋,每月600块钱。”王光谦问学生:“你都是副教授了,怎么住这种房子?”

学生说:“不住这儿住哪儿?我就是知识分子里的农民工。”

“我们调研了一番发现,青年人才待遇低是普遍现象,而且他们基本是给老板打工,跟农民工差不多。”王光谦说。

西部待遇更差,因此难以吸引人才。王光谦2013年去青海大学当校长,他发现:“东西部的区别,就像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差别一样。”

青海大学2000名教师,有博士学位的只有167个,相比之下,同类型的郑州大学有2000个博士学位的教授。

“老师都不是博士,能带出像样的博士生吗?”王光谦说,“但我们就是招不来。我们的二级教授7000多块月薪,而西宁是物价高的城市。跟省政府去说,省政府说你们不错了,还能拿5万年薪,省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平均只能拿三万八。这么一说,我们也确实不好意思再问省里要钱。”

为此,王光谦去年就呼吁国家出钱,为西部增加人才岗位,“给来西部的博士加一年10-20万的津贴,允许他们干5年就走人,再换人来干。不求他干一辈子。”

(上接第一版)

北京市规定,投资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或生物医药领域企业,满足一定条件的给予不超过15%、单笔不超过45万元风险补贴,单独机构年度补偿上限为150万元;江苏省出台《天使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天使首轮投资种子期或初创期科技型小微企业,若发生损失,按实际损失额50%从风险准备金中补偿、最高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使用了各种手段促进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发展,包括定向税收减免、提供政府贷款和担保,甚至直接动用公共财政资金创建天使基金等。

比如,以色列政府为了吸引海外资金对本国风险基金的投资,设立了每年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损失

科技界科协界委员热议焦点

要公平竞争的环境 摒弃计划经济老套路

本报记者 高博

“我们的科技管理理念总体上有变化,但时不时也会冒出来旧的思想,‘十三五’草案里就有几处。”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委员说。

“比如企业创新这一块,草案里写着写着,老套路就来了——‘深入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寿子琪说,“强大的企业不是‘百强工程’搞出来的。”

企业经历自然淘汰和成长,才能冒出尖子。我建议别再写什么‘百强工程’,政府需要做的,是给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寿子琪又指出草案一个“扎眼”处——要打造一批双创的示范基地和城市。

“这下完了,大家又要去争,去申报了。是不是

做示范基地和城市才能‘双创’?过去政府打造的一些‘基地’,到底能有多大用处?我很怀疑。”寿子琪说。

同样,规划里“创新人才培养的示范基地”一段也令寿子琪不敢苟同。

“规划提出‘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创新精神的的企业家’,我不知道用什么课程、什么方法去培养?现在这么多企业大佬,难道把他们学过的课程作为必修课吗?企业家也是自然产生的过程,是眼界和魄力,智商和情商,的结合,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政府给一个好的企业家环境,就够了。”



3月8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科技界别政协委员在两会驻地进行联组会议,联系本界别实际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图为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右)参加科技界别联组会议,与委员们热情交流。

医生被逼整论文 评价机制不合理

本报记者 高博

“去年影响很大的退稿事件,大部分论文来自医学界。”旁听3月8日政协会议科协界联组会议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告诉委员们,“这跟‘唯SCI’的科技评价有关

系。非要让医生写论文,许多人写不出,就找第三方帮着写。这就乱套了。其实医生能看好病就是高水平,不必要看他的论文。今后评价科技人才,应该是多渠道、多主题的。”

尚勇说,近年来科技界抱怨最多的,就是唯论文指标的科研评价体系。尚勇认为,论文指标评价体系曾经起到很大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显现。目前国家正在起草新的文件,集中关注科技评价导向改革问题。

另外,谈到人才资助,尚勇表示,科协最近推出了一个“青年人才托举计划”,经学会推荐,科协每年资助200名32岁以下的科学家。“一人一年给15万,连续给3年。45万怎么花由自己做主。”

科学家得有民族责任感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现在老百姓有些不好听的话,说科学家‘立项时一拥而上,完事后一哄而散’。”中科院副秘书长曹效业委员在8日政协会议科协界联组会议上说,中国应该有更高效的科学队伍和更有民族责任感的科学家。

曹效业说,从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到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和德国威廉二世建立自己的科学院,新兴国家都要有一支“科学军队”,推动国家崛起。“目前我国重启了国家实验室建设,如果

把国家实验室类比为‘战区’,它就应该负责某

一战略方向的主要机关,负责这个方向的作战指挥;高校、科研院所就好比一个个兵种,负责把学科建设好,把人才培养好。国家的建设思路应该更清晰,否则项目立了、口号喊了,可能过了十年也没有进展。”

此外,对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科学家,曹效业认为应该有更强的民族责任感。“咱们科学界应该倡导自由竞争,但目前争夺项目,‘为各自战’的局面,不适应国家对科技界的要求?我们也要扪心自问。”

■两会声音

程津培委员:“增加基础研究投入”这句话怎么不见了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记者张盖伦)“问题说了这么久,有关部门耳朵可能都要长茧了。”中科院院士程津培委员再次谈起基础研究投入偏少的老问题,觉得无奈。“为什么我们总是老调重弹,因为投入一直没有变化;没有变化,这就是问题。”

201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预计为2.1%。这个数字意味着,“十二五”规划列出的“R&D经费占GDP比重应该为2.2%”的预计目标没有实现。它也是“十二五”规划21个核心指标中,唯一没有完成的指标。如今,“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提升到2.5%,也就是说,以后每年的R&D投入增长率应该在10%以上。

程津培研究了近几年的R&D投入。毋庸置疑,总数一直在上升,但是每年增长的幅度却在走低。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根据每年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从2012年到2014年,R&D经费相比上一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8.5%、15%和9.9%。“如果再看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的增幅,连续两年都为4.4%。它理应在基础研究投入中起到‘龙头老大’的作用。从这个数字来看,财政投入的引领作用还是比较薄弱。”更让程津培忧虑的是,连续多年,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的比例都维持在5%左右,成了一种“常态”。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论文产出量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引用率世界第四;另一方面,问题同样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不足,大师级人物不多,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贡献不大。问题出在哪了呢?”

投入或许是病根之一。程津培指出,国际上,科技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多在15%到20%之间。“我之前还看过一则送给有关部门的材料,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统计口径有问题,使得数字偏低。但是,统计不够严谨,有统计不足的地方,同样也有统计过度的地方!”说到这里,程津培几乎都有些着急,提高了声音,“基础研究是研究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我们可以好好坐下来研究研究,看看统计上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不能以统计数字不准确为由,否认基础研究投入偏少的事实啊!”

程津培特意提到了他的一场“空欢喜”。“这本‘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我来开会之前看过另外一个版本。那个版本里,在‘增加财政科技投入’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程津培当时兴奋了好一阵,专门拿笔记下来。然而,两会期间正式下发的规划纲要,已经删去了这句话。“这句话没了,一定有没了的道理。只是我有点恍惚,开始怀疑自己当时是不是真的看到这句话。”他自嘲地笑了笑。

原始创新出自基础研究,而重大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成果,更是“非卖品”,非得自己攻关不可。程津培说,5%这一比例,不应成为基础研究投入的常态。“这是用持续多年的低投入,来拿未来做赌注。问题是,这场赌局,我们国家输不起。”

基础研究投入:少,但没那么少

(上接第一版)

他指出,4.7%是指用于973、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项目的净投入,但是如果把中科院和高校的事业费算进去,就远远不止了。目前,仅中科院每年的事业费就达200多亿,高校则更多。据统计,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投入约占GDP的4%,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向各个高校。

“把这一块算上就不是那个比例了。”王志刚说,“只有统计口径一样才能比较。所以,如果跟美国比基础研究投入,我们就存在一个少算的问题。”

王志刚的话音刚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主任陈和生就表示赞同。

他举了一个小例子: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曾经组织过一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其中美国能源部投入3400万美元。但是,折算成中国的投入,真正的研究经费只有1000万美元,其他都是人员费、差旅费、办公费等。

“但总的说来,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仍然是经费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特别是市场和企业不愿做、没有能力做的时候,政府就该担当投入的责任。”王志刚最后这句话让朱志远和其他代表们吃上了定心丸。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天使”折翼:该不该用财政疗伤

补偿资金,为风投公司提供相当于投资损失10%-15%的补偿。

在美国,至少21个州出台了针对天使投资人的税款抵免措施,根据各州情况不同,可抵免税款额度从15%-100%不等。英国在1995年推出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促进计划”,规定满足条件的创业投资基金可获得税收抵扣优惠。

爱拼才会赢,换个拼法行不行?

“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真正的创业者,进行社会资本的宏观引导,是调控职能的体现,也切合财政资

金按创投、拨改投的改革方向。”天使投资人、启点咖啡创始人薛军认为。

尽管如此,仍然有专家表示,财政补贴的项目往往伴随极高的道德风险,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出现权力寻租空间。

“魔鬼就在细节中”“如果不注重细节设计,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寻租空间,影响该措施实施的效果。”中国科学院大学尹锋林副教授说。

“对于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相信政府部门一定是有过思考的,难道我们想过的骗补,政府就想不到吗?”全国政协委员、盛大网络董事长陈天桥对

此持不同意见。

对于防止恶意骗补、弄虚作假,各地都给出了解决方案。江苏省科技厅表示,若发现弄虚作假骗取资金、不配合检查、不提供财务报表、投资进展等材料的,将解除风险补偿合同,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广东省还增加了“将企业及责任人列入诚信黑名单并给予限期搬离孵化器相应处罚”。

相对于社会舆论对政策执行层面的关注,专家们更愿意探讨政策的设计安排。

从国际经验不难看出,欧美国家对于天使投资风险

的补偿主要采取“事前”策略,税收优惠是最常见的

扶持工具,而国内更多的是以财政资金扶持。

王雪莹认为:“这是因为国内地方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有限,其中财政工具是最具可操作性的,而在税收环节上的地方政策创新空间则不大。”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今年将拿出5000亿元用来减税降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这相当于政府以让利方式为企业提供了发展资金。”贾康说,与过去单纯加大政府投资和给予企业财政补贴相比,减税降费的政策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一种重要的制度供给创新。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未来中国的财税政策将更加贴近市场规则,类似上海补偿新政的争议会越来越

少。(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